

埃以“冷和平”影响初探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田志馥 于亚娟

【内容提要】 埃及是最早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阿拉伯国家，和解后的埃以关系却陷入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状态。事实上，埃以之间形成了一种“冷和平”。本文从“冷和平”角度对埃以及中东和平进程等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979年埃以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平条约之后，两国并没有走向正常的国家交往，而是处于一种脆弱、微妙、不冷不热的状态。从1980年2月埃以互派大使至2005年3月埃及复派驻以大使，25年间埃以两国几次断交，双边关系历经坎坷。不过，双方都没有放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方式，两国再没有滑入战争边缘。大部分中东问题学者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冷和平”，并对其成因及表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是，关于这种“冷和平”产生的影响，尤其对于中东和平进程的深远意义，学者们很少涉及，笔者仅就此问题做一阐述。

一、“冷和平”有利于埃及利益最大化

首先，埃以之间不冷不热的状态，为埃及重返阿拉伯世界提供了前提条件。1979年3月27日，即埃以签订和约的第二天，阿拉伯联盟在巴格达召开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特别会议。会议提出了对埃及实施严厉的政治和经济制裁的决议。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所属组织，如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阿拉伯货币基金董事会等撤出埃及，终止埃及在阿盟的成员国资格，阿盟总部由开罗迁往突尼斯，巴解组织也关闭了驻开罗的办事处。先后有17个阿拉伯国家宣布与埃及断交。与此同时，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也谴责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总之，萨达特在为埃及赢得和平与发展的同时，也导

致埃及脱离了阿拉伯大家庭，损害了同非洲国家和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友好关系。穆巴拉克上台后，在与以色列保持“特殊关系”的基础上刻意保持一定距离。与此同时，又采取措施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沟通和联系。

1982年6月，以色列大规模入侵黎巴嫩，埃及朝野愤慨，在贝鲁特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发生大屠杀事件后，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冻结了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美国和以色列对埃及多次施压，要求埃及复派驻以大使。1984年末，穆巴拉克政府提出改善与以色列关系的三个前提条件：1. 结束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2. 改善西岸、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3. 解决西奈半岛塔巴争端。穆巴拉克顾及阿拉伯国家利益的做法，受到阿拉伯国家的肯定。穆巴拉克还多次向阿拉伯世界表明，埃以和谈仅仅是埃及朝着全面解决中东问题迈出的第一步，而中东和平之路还有很漫长的艰难路程。

1989年2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表示巴解愿在国际会议范围内“与以色列举行直接或间接的谈判”，并希望埃及居间斡旋，以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高级会谈。5月，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决议，正式邀请埃及重返该组织。10个月后，阿盟总部各机构也全部迁回开罗，埃及外长马吉德在5月中旬当选为阿盟秘书长。在经历了近10年的被制裁、被排斥的“孤立”之后，

埃及终于重新回到了阿拉伯世界。

其次,埃以“冷和平”增加了穆巴拉克外交回旋余地,使得以色列不能小觑埃及在中东地区及中东和平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同时,这种和平的状态也使得埃及收回了通过战争未能收回的失地——西奈半岛。1980年2月,在以军尚未从西奈半岛全部撤出之际,萨达特宣布与以色列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遭到了埃及国内的强烈发对。穆巴拉克执政后在西奈半岛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在以色列最后撤出西奈以前,贝京提出了要求穆巴拉克访问耶路撒冷,遭到了穆巴拉克的拒绝。之后,贝京又要埃及在以色列最后撤出西奈前提供比《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更进一步的保证,埃及只表示它遵守《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拒绝做出新的让步。穆巴拉克说:“埃及希望和平,但不能不计代价。和平是有尊严的,和平不能靠让步。”¹穆巴拉克的强硬立场迫使以色列遵守《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于1982年4月从除仍存在争议、面积仅一平方公里的旅游胜地塔巴以外的西奈半岛上全部撤离。1986年9月11日,两国就塔巴归属问题提交国际仲裁机构。国际仲裁机构经过近2年的审议,于1988年9月29日做出了塔巴归属埃及的裁决。1989年3月,穆巴拉克在塔巴亲手升起了埃及国旗,塔巴回到了埃及的怀抱。埃以边界争端终于得以和平解决。埃及通过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却用和平的手段达到了。

再次,穆巴拉克在阿以之间搞“平衡外交”,彰显了埃及在阿以和谈中无可代替的作用。美国要想在阿以和平进程中有所作为,不能不对埃及予以尊重,不能不借助埃及这一独特的政治作用。因此,从埃美建交之日起美国就向埃及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美国对埃及的援助主要为两个部分:一是经济援助。美国国际发展署对埃及的援助计划始

于1975年,对埃的大量援助始于1979年,也就是《戴维营协议》后一年。从1975年至2002年,美国国会每年批准向埃提供约8.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共计255亿美元。但是,从2000年美国开始将对埃及的开发援助从直接援助转为贸易。因此,美对埃的经济援助将每年递减5%,从2000年的7.35亿美元减至2009年的4亿美元。^④二是军事援助。自埃以和约签署以后,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约13亿美元的军援,帮助埃军将它的武器装备现代化。据统计,1979年至1984年美国向埃及提供了多达68亿美元的军援,使埃及成为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受援国。1985年提供军事赠款10多亿美元^⑤。美国是埃及武器的主要来源国。据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统计,1979年至1983年埃及武器总进口56.45亿美元,其中美国武器为24亿美元,占40%以上。埃及从美国购买的主要武器是飞机、坦克、装甲车和导弹。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至1985年,埃及从美国订购飞机45架,坦克和装甲车1500辆,各式导弹约230枚。到1987年,美国向埃及提供的军援达95亿美元,提供了包括F-4、F-16战斗机、坦克、空对空导弹等在内的先进武器。此外,埃美两国军队每年还要联合举行多次军事演习。

二、“冷和平”对以色列的影响

首先,“冷和平”状态确保了以色列的西线安全。从1948年到1973年的25年间,埃及曾4次卷入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地区性战争,而且是阿拉伯军队中的主力。埃以签署和约后再没有发生武装冲突。以色列等于消除了埃及这一在阿拉伯世界最强有力的

¹ 万光、陈佩明:《变动中的埃及:来自金字塔下的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50页。

^④ 叶青:《埃及外交政策新论》,《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6期。

^⑤ 徐建国:《军火贸易——国际关系中的特殊战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91页。

威胁。卡特总统曾说：“今后对以色列的任何军事威胁的关键是埃及人，这一点相当明显，因为大举进攻主要靠埃及出兵，在以前的战争中也总是埃及军队打头阵。在同以色列的几场战争中伤亡最重的是埃及。今后无论任何和平解决方案埃及的态度举足轻重。”保持这种“冷和平”对以色列而言意味着消除了对以色列西部的威胁，使以色列得以集中力量对付东线和北线，减轻了以色列的压力和负担。

其次，埃以关系若即若离的状态分化了阿拉伯世界，实现了以色列外交战略目标。“埃及风暴”即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埃以和约》及埃以建交，在阿拉伯世界曾掀起轩然大波。埃及被“拒绝阵线”逐出阿盟。后“拒绝阵线”提出如果埃及撕毁《埃以和约》，断绝埃以外交关系，就可以重返阿盟。穆巴拉克断然拒绝。埃以依然保持着不冷不热的状态，阿拉伯世界也由此陷入近10年的分裂状态。阿拉伯世界的这种分裂状态为以色列乘虚而入、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从此，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进攻以色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色列借机巩固了自身的安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埃以之间的和平微妙、不稳定，但足以说明维持正常的埃以邦交对以色列整体安全意义重大。而且，埃以“冷和平”也最终推动了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由敌对走向和谈的战略性转变，并产生了积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促成约旦、毛里塔尼亚等阿拉伯温和国家也相继同以色列建立了不同级别的外交关系。以色列由此摆脱了持续多年的“中东孤儿”窘境。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冷和平”对以色列发展与埃及的经贸往来却是障碍。埃以早已建交，两国之间经济往来本应是顺理成章之举。埃及丰富的资源与以色列发达的科技可以互补。但是，埃以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水平一直很有限。对此，以色列颇有微辞。

以色列多次表达希望实现经济、文化及宗教等交往的正常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埃以两国有关天然气项目的谈判就已经开始，但由于新一轮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导致埃以关系趋于冷淡，谈判进程被搁置。在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长期对立的背景下，埃以之间的经贸关系很难得到长足发展。实际上，低水平的经济关系是与低迷的政治关系相一致的，这也是埃以“冷和平”导致经济和政治不能形成良性互动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冷和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

由于埃及是最早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以及穆巴拉克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逐渐为阿拉伯世界所接受，自1986年9月埃以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后，埃及逐渐成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传话人”。1989年埃及正式重返阿盟，为埃及在促成阿以对话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舞台。同年6月，埃及外交国务部长加利访问以色列时正式表示，埃及愿充当巴以之间的调解人。同年8月，穆巴拉克在访美时提出了《关于在以色列占领区举行选举的十点和平建议》。主要内容是：以色列必须撤出选举区；以色列保证接受选举结果；选举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停止建立新的犹太人定居点；居住在东耶路撒冷阿拉伯选区的巴勒斯坦居民必须参加选举等，¹阿拉法特接受了埃及的建议。以色列工党原则上同意了埃及的建议，时任国防部长的拉宾赴开罗与穆巴拉克会谈，双方达成巴以必须对话的共识。但是，迫于利库德集团的坚决反对，这一计划最终流产。1993年9月，在穆巴拉克的斡旋下，巴以通过了《关于在加沙-杰里科首先实行自治的原则宣言》。有关自治协议的每一个重大原则问题谈判都是通过

¹ 阎瑞松主编：《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216页。

“开罗对话渠道”确定的。1993年6月初，佩雷斯的前政治顾问诺维克同阿拉法特举行了“间接会谈”，中间传话人是一名埃及外交官。他们讨论了自治协议起草的程序、框架以及在挪威谈判代表的授权、资格等问题。不久，以色列环境部长约西·萨里德和巴解代表纳比勒·沙特就耶路撒冷问题在开罗对话。以色列方面希望在自治协议中不要谈耶路撒冷地位这个敏感的问题，巴方虽有保留，但几经讨论，巴方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7月，以色列卫生部长哈伊姆·拉蒙赴开罗与阿拉法特直接会谈。此后，在埃及主持下，巴以在埃及举行了10多轮落实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开罗协议》。在该协议谈判的最后关头，是穆巴拉克的两次介入才使谈判起死回生。在1994年5月4日的签字仪式上，拉宾和阿拉法特因附件问题发生争执，协议眼看就要告吹。穆巴拉克和其他出席签字仪式的领导人赶快退回幕后对两人进行劝说，这才使协议得以签署。

巴以关于巴勒斯坦大选问题的谈判，也是在埃及举行并达成一致的。1995年9月，在埃及等国的积极斡旋下，巴以又达成扩大巴勒斯坦自治的《塔巴协议》，巴以和平进程再向前迈进了一步。1996年5月，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袖内塔尼亚胡当选为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执行拉宾政府同巴勒斯坦达成的有关和平协议，在和谈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导致巴勒斯坦抵抗活动加剧，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局。穆巴拉克呼吁内塔尼亚胡认真执行已签署的有关协议，同时劝告巴勒斯坦人不要对和平丧失信心，他还具体提出了恢复巴以和谈的五点建议，其中包括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新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自治当局努力打击恐怖活动等。¹ 1998年10月23日，在美国等多方的压力之下巴以终于达成《怀伊协议》。

1999年以色列工党领导人巴拉克执政后，埃及积极支持恢复巴以和谈，一度使巴以和谈出现转机。但由于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会谈没能再次取得进展。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无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权利，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流血冲突，以阻止中东和平进程。此时，又是穆巴拉克积极邀请巴勒斯坦、以色列、美国、约旦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欧盟外事负责人索拉纳于10月16-17日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召开中东问题多边首脑会议，讨论结束巴以流血冲突，重新举行和平谈判。遗憾的是，不断升级的冲突发展成了新一轮旷日持久的暴力对抗。2004年11月阿拉法特去世，埃及积极与巴以双方沟通，最终决定在开罗为阿拉法特举行葬礼，解决了因阿拉法特葬礼给巴以双方及阿拉伯世界带来的难题。2004年12月埃及释放了已被定罪和关押了8年之久的以色列间谍阿扎姆，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推动以色列释放在押的巴勒斯坦囚犯。2005年2月，穆巴拉克邀请巴、以、约加上埃四国首脑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会晤，实现了巴以领导人4年来的首次会晤。在这次峰会上，巴以和谈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宣布正式结束已持续4年多的暴力冲突。2006年5月，奥尔默特出任以色列新总理。6月，奥尔默特访问埃及，在沙姆沙伊赫同穆巴拉克举行了正式会谈，进一步探讨打破中东和平进程僵局，寻求重启中断已久的巴以和谈。这足以证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倾注了埃及领导人的大量心血和汗水，埃及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中可谓功不可没。正如埃及前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勒博士所言：“虽然美国自和平进程之初即起了一种主要作用，但不能忽视埃及的核心作用。（下转第52页）

¹ 陈建民主编：《埃及与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39页。

子在中东积极兜售“大中东战略”，鼓吹自由、民主，希望借对伊拉克战争给中东带来和平，并由此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源。美国和以色列对通过民主选举获胜而当政的哈马斯不仅不予承认，还大力抵制、制裁和军事打击，使得巴以冲突的解决和中东和平进程不但未能取得进展，甚至还有不断恶化之势。2007年5月17日以来，以军持续武力打击加沙地带以哈马斯各派为主的巴勒斯坦武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5月27日，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对内阁成员表示，以色列将继续打击哈马斯武装，强调“没有一个人能豁免”。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联合国未能有所作为，秘书长潘基文仅在5月21日对以色列军事打击巴勒斯坦武装造成巴平民伤亡表示关注。

以色列仅与土耳其、约旦、埃及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众多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尚未解冻。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使得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解放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他一些民族争取独立的旗帜。“在过去的事件里，推动反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力量时起时落，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根本的现实将很快发生改变。”

可以预期的是，由于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许多现实的客观因素还在有力地牵制着它在联合国这一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仍然不会融洽。

(责任编辑 周仁民)

(上接第35页)

萨达特总统亲赴耶路撒冷为和平开拓新路，每当和平进程陷入僵局时，埃及总是帮助克服这些困难与障碍。”¹ 巴勒斯坦驻阿盟大使萨伊德·加马尔也认可这一点：“巴勒斯坦人信任埃及，没有它，我们将不能坐到谈判桌前。”^④由此可见，埃以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有助于埃及更好地充当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调解人，有助于中东和平进程不断向前推进。

综上所述，埃以自建交以来形成的“冷和平”局面给埃及、以色列及中东和平进程带来的积极作用多于负面影响。穆巴拉克灵活务实而又不失原则地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逐渐为阿拉伯国家所接受。1989年埃及重返阿盟，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被孤立期，这是阿拉伯国家对埃以维持“冷和平”局面的最大认可。埃及维持与以色列不冷不热的关系，增加了穆巴拉克的外交回旋余地。美国与以色列都不能忽视埃及在

中东地区的大国地位。埃以“冷和平”实现了埃及利益的最大化。以色列则通过与埃及保持和平，成功地确保了以色列西线边境安全并且分化了阿拉伯世界，致使阿拉伯国家不能像前四次中东战争那样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以色列。因为埃以升温的关系，双方的经贸和文化交流都有限。对此，缺乏资源的以色列虽多有不满，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感到心理平衡。对于中东和平进程而言，正是埃以的“冷和平”使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沟通不可或缺的角色，每当中东和谈受阻时总能看到埃及在穿梭斡旋，埃以的特殊关系在维护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 周仁民)

¹ [埃及]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勒：《埃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国际论坛》2000年第4期。

^④ 转引自陈天社：《埃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世界民族》2005年第3期。

The Diplo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ve Central Asian States Diversified and Pragmatic

Zhao Longgeng

The Central Asia, because of its ascendancy in strategic loca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that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big powers and group of power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geo-strategic reality, the five central Asian states have pursued diversified and pragmatic foreign policies since their independence. By maneuvering among big powers and making best use of various advantages, they have successfully coped with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safeguarded their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such a policy will continue as it is.

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e “Cold Peace”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Tian Zhifu Yu Yajuan

Egypt is the first among Arab states to make peace with Israel, but the Egypt-Israeli relation has been neither cold nor warm, neither close nor far apart since their reconciliation. In fact, Egypt is in cold peace with Israel. This article tries to look into the Egypt-Israeli relation and issues related to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in the cold peace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Energy and Its Security Issues among the ASEAN Countries

Song Xiaofeng

In the wake of the Cold War, the Southeast Asia sta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uclear-free zone. But with world oil and gas prices soaring over the recent years, some of the ASEAN countries began their civilian nuclear energy development projects, notably Indonesia, Viet Nam, Thailand, Burma, the Philippines and Malaysia. Th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ssue brought about by these countries' nuclear energy development has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force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ASEAN, which also poses new challenge to the ability of the ASEAN to coordinate on and manage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eventually affecting the internal reform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ASEAN.

Relationship between Israel and the UN

Liu Jun

While, to some extent, Israel is the product of the UN resolution, its relation with the UN has not been very smooth over the past 50 years. After a short honeymoon, Israel's relation with the UN took a downturn and remained in bitterness. Nonetheless, its relation with the UN began to ease up from the 1990s and further improv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This article looked into the backdrop of these phenomena, went into the deep-rooted causes that affect Israel's relation with the UN,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